



赵国华

史学论文初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赵国华

史学论文初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赵国华史学论文初编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印刷:十堰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315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书号:ISBN 7-216-03511-9/K·363

自序

任何一类学术研究，都需要不断的开拓，也需要及时的总结。开拓是总结的条件，总结是开拓的基础。我很赞赏别人以自选集的形式，来展示个人的学术得失，但真正轮到自己头上，却不免踌躇再三，一则个人学识有限，有些著述较粗浅；二则个人兴趣广泛，研究问题很零散。面对这种状况，虽然说有一定的收获，但仍需要不断的完善。所以，当这部集子编成后，就以“初编”命名。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初步的研究，二是初次的结集。我希望通过这个初编，对以往的学术研究，做一次认真的总结。

—

在近二十年中间，我的学习和研究过程，可以分出几个阶段：1983—1986年间，以秦汉史为主攻方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先弄懂秦汉史，并初步地了解先秦史，以便日后自上而下，探索其他断代史，乃至近现代和当代史，最终形成通盘研究。从目前所及看来，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还需要做更多的准备。或许付出毕生的精力，都难以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初衷不改，仍愿为此努力下去。

1986—1989年间，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研究重点。我

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决不是朝秦暮楚，而是对史学有所感悟：要求得对历史上某个问题的深刻理解，必须有对现实中同类问题的深切体会，而要求得对现实中某个问题的深刻认识，必须有对历史上同类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系统清理，不但能增进对中国现当代史的了解，也能加深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因为不深入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构筑的历史体系，就很难对时下人们习以为常的、被当作不证自明的认识前提，包括概念、话语、结构、模式作出深刻的反思，自然也就无法弄清中国历史的特点和规律，及其与西方文明演进的差异。何况中国史学史研究，只谈古而不论今，总让人感到有些缺憾。不啻如此，这“朝古暮今”的做法，更使我在教学工作方面，得以连续多年讲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课程，还屡次试以“郭沫若现象”、“二陈之异同”等题目，来激活学生的思路，找寻当代史学的脉络，领略一代学者的风采。

1989—1996年间，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除对传统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传统进行过初步的探讨之外，对历史上的皇位更迭问题，也作过较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对中国传统谋略，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依我个人之见，单凭对儒家文化、儒道互补或儒释道三教同流的诠释，想求得对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和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仅就思想论思想，至多能弄清学派史、教派史，或者学派与学派、学派与教派之间的互动关系，却无法涵盖社会历史的整个画面。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本质上是人的思想和行为过程。对人的行为进行策划，制定出具体的行为方法，并在行为过程中随机应变，是弥漫于整个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包括儒释道三教的信徒，都不可能完全例外的事情。传统谋略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灵活性的文化形态，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把传统谋略作为一门学问，进行多层次的开掘和整体性的构筑，极

有可能打破长期以来文化史研究所存在的诸多片面倾向，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然而，要想构筑一门新学问，总不会一帆风顺，艰难的学术跋涉，时常令我觉得举步维艰。所以在这一期间，有时候只管读书，而不愿意著述；把一部《二十五史》读罢，除留下一摞笔记外，并未写出几篇文章。甚至在读过中国谋略典籍后，又去阅读西方谋略著作。中国和西方谋略理论，将成为我下一步的研究课题。

1996年以来，主要从事中国兵学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迄今仍处于有兵学，而没有兵学史的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军事学和历史学的隔阂。研究历史的学者不重视军事学，因而不了解军事学；研究军事的学者不重视历史学，因而不了解历史学。这样就很难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问题；或者从军事学的角度，去研究历史问题。我很偏爱中国军事史研究，并且不间断地钻研军事学，以弥补理论上的不足。在经过认真准备后，开始向中国兵学史进军，尽管时常有所困惑，但因为心有所系，也能够勇往直前。好在做到现在，这项研究已经有很大的进展，或许在日后不久，就可以告一段落。

在我个人看来，任何一类学术研究，都要消除急功近利的心态，摒弃粗制滥造的做法，乃至突破计划学术的模式。急功近利必然招致粗制滥造。这种学术弊端的产生，除去个人因素之外，与计划学术的模式之间，很难说没有关联。所以，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以学术自由为根本，以独立思考为前提，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锤炼求实创新的功夫。

当然，仅就历史研究来说，选择什么研究路径，则完全取决于个人。人们依照不同的思路，研究各种历史问题，既可以“找规律”，也可以“还面目”，还可以“搞鉴赏”。惟有形式多样，方能绚丽多彩；惟有识见高明，方能传之久远。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过大家的苦心经营，再来看中国史学界，会有一个

新的面貌。

二

这部集子收录论文 26 篇,大体上可以分为 6 组:

第一组 4 篇,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综合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以君主专制为核心、中央集权为形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专制主义、官僚政治、政教一体、华夷分治等特征,制约着传统政治的走向,支配着传统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淀,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传统,包括“明君·贤臣·顺民”的政治图式,“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谋略,依从与权力崇拜的政治心态,反过来对传统政治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消极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焦点,皇位更迭繁纷复杂,从改朝换代的角度看,有同一皇朝内部和不同皇朝之间的区别;从国家权力的运作程序看,有按正常程序进行和非正常程序进行的区别;从政治矛盾与冲突的角度看,有运用暴力手段和和平方式的区別;从皇位与皇权的关系看,有皇位与皇权相合和相分的区别。不同形式的皇位更迭,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谋略是人类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能力、技巧和方法,具有非科学性、超时代性、普遍性、灵活性等特征。中国传统谋略理论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曾经出现过三个主要流派:兵家谋略、法家谋略、纵横家谋略,对传统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组 5 篇,是对秦汉时期政治、军事问题的研究。汉武帝的战争艺术,突出表现在善于处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局部中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关系,善于实施重点进攻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善于运用速战速决、分进合击等战术原则。王莽改制主要因为丧失应有的社会基础,加上没有确切的指导思想和适当的改革措施,没有一个齐心协力、集思广益的最高统治集团,没有一个能够

贯彻执行各项改革措施的地方官僚系统,其失败的厄运自然无可避免。汉光武帝统一全国,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略定河北、进取关洛、扫平关东、经略西北、攻取巴蜀五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既能按照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去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又能依据战略形势的轻重缓急,来确定用兵的主要方向;既能着眼于敌方的特点,来制定具体的作战方案,又能适应战争情况的变化,从战略上予以及时的转变,这是所有割据势力无法比拟的。东汉时期所谓“清流”,包括朝廷、地方两类清明的官员,从维护国家机器、稳定社会秩序出发,在民本理念的引导下,或者关照民意,要求净化朝廷;或者关注民情,主张整顿吏治;或者关怀民生,强调发展生产;或者关心民俗,提倡革新风尚,在朝廷政治和地方事务中,充当着中流砥柱的角色,发挥着扬清抑浊的作用。“凉州三明”有着不同的品格、才能和素质,因而对待羌族暴动,坚持不同的军事方略;对待“党锢”事件,采取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能够扬名于京师,说明东汉后期的“清议”运动,尽管以京师为中心,而评议对象遍及全国;他们作为凉州士人的代表,关注并参与朝廷政治,直接影响到时局的变动。

第三组4篇,是对战国、三国时期外交问题的研究。战国时期的秦楚关系,在秦国方面,善于根据天下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外交方略,无论是“联楚”、“存楚”,还是“谋楚”、“灭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在楚国方面,缺乏长远的战略计划,局限于眼前的利益,出现不应有的失误,从“亲秦”、“联秦”到“伐秦”、“抗秦”,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着两国的命运,影响到战国历史的动向。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自然地结成三个对子:魏吴、吴蜀和蜀魏。就这三者的表现而言,吴蜀关系从联袂伙伴转为敌对政权,而后又经过正式结盟,长期处于友好状态;魏吴关系从魏主吴仆转向分庭抗礼,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蜀魏关系始终没有缓和的迹象,显得较为单调。特别是吴蜀关系,作为彼此相互制约、相互

利用的产物,对于三分格局的相对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面对来自曹魏的威胁,保持友好的外交往来,是吴蜀两国赖以生存的基础,但随着潜在矛盾的激化,彼此又发生严重冲突,可见吴蜀统治者立足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总带有一定的谋略构想。至于分析赤壁之战,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参战的军队是强弱不等的三方势力,核心的问题是统一和割据的两种立场,最终的结果是趋向三分的一个前途。赤壁之战创造出三分格局的条件;刘备夺得益州地区,意味三分格局的确立;荆襄之战标志着三分格局的稳定,这前后两个发展阶段,把三国历史推向高潮。

第四组 5 篇,是对秦汉学术的研究。司马迁史学的成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并藉此编撰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进而提出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民族、道德观念,并展示出博观约取、直书实录、详近略远、文史交融的治史特色。《后汉书》的序论赞,“序”全都放在卷首,或概述事物的源流,或指出立类的标准,或说明序论的依据,由此提示书法义例;“论”置于评论对象之后,或解释皇朝的兴亡,或论述人物的是非,或评议为政的得失,或提示人情的长短;“赞”以精炼的韵语来表述,或寄寓褒贬之意,或总结历史经验,或评价历史人物,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三部分内容合在一起,反映出范曄的史学思想。东汉儒学主体评论,包括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前者是衡量儒学主体的社会政治作用的内在尺度,后者是评判儒学主体的学术成就的客观依据,其实际情形表明:一般儒生较为推崇“通儒”、“儒宗”,“通儒”比较轻视“俗儒”、“浅儒”,朝廷除任用一批名儒、大儒外,也很敬重“宿儒”、“耆儒”,儒学主体评论对于调节儒学主体和儒学、儒学和现实社会的关系,起着中介的作用。荀悦《申鉴》成书于建安十年八月,《后汉纪》的记述完全可信,而《后汉书》的叙述不当,造成“鉴”先“纪”后说。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既以个人爱好为动因,又以招揽政治势力为目的。鸿都门学不

是现代意义的学校,而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场所;鸿都门生也不是鸿都门学培养的学生,而是朝廷征辟的一批官吏。对于鸿都门学的认识,显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教育问题,或者是思想、文学、艺术问题,而主要是政治问题,具体一点说是选举问题。汉灵帝重用鸿都门生,有悖于正常的选举制度,有碍于朝廷政治的进步,因而加剧了统治集团的矛盾,促使东汉皇朝走向崩溃。

第五组4篇,是对中国兵学史的研究。中国兵学是中国传统时代探讨战争、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方法的学问,从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形成,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直到晚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它以兵法、兵略、兵制、兵器和兵家为研究对象,体现出整体性、综合性、实用性和连续性的学术特色,保持着崇尚和平,重视战争;高扬正义,讲究功利;强调实力,注重谋略;突出将帅,关怀士卒的优良传统,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汉代兵学文献整理活动,从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到杨仆编纂《兵录》;从任宏“论次兵书”,到刘歆修撰《七略》,都有着突出的贡献,而把传世兵书区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个类别,既是中国最早的兵学文献分类,又具有学术批评的内涵,说明在汉代学术领域里,兵家被列于诸子之外,兵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已经有它的学术体系。唐宋时期,武举制度的创立,武庙、武学的设置,《武经七书》的刊行,从制度、教育和学术层面,促动着兵学的发展。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兵学经历巨大的转变,从私学过渡到官学,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刘寅编撰《武经直解》,以儒家思想作指导,“讹舛者稽而正之,脱误者订面增之,幽微者彰面显之,博杂者辨而析之”,成为《武经》研究的佳作。

第六组4篇,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生发展,大体经历过六个时期:1919—1930年为奠基时期,1930—1941年为开拓时期,1941—1949年为形成时期,1949—1966年为整体发展时期,1966—1978年为严重挫折时期,

1978—1989年为全面复兴时期,这一史学形态在其形成过程中,富有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实践性、高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以及批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战斗性,而当超越与资产阶级史学并驾齐驱的地位,在大陆处于一枝独秀的条件下,既有非常突出的学术成就,也有许多明显的失误,大致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史学实践,摸索出一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以史论统一为原则、包括传统史学方法在内的历史研究方法,并据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有力的论证,从而构筑起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体系。郭沫若对韩非子的研究,包括考证《韩非子》的成书,探究韩非的思想根源,论述《韩非子》的基本内容,评价郭非子学说的价值,是其先秦诸子研究的重要篇章。

上述这些论文,有的曾经发表,有的未曾刊布,在这次编辑过程中,有的保持原貌,有的略作修订。我个人十分清楚,这点成就微不足道,但既然公开问世,就想借这个机会,多听一些批评,领受一些教益。

三

这部集子的选编,正值我的不惑之年。就个人经历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初步的总结,也是一份厚重的纪念。所以,读着一篇篇论文,翻过一页页文稿,许多往事与近情、新朋与故交,都一同聚集在眼前,使我浮想联翩,感动不已。

我要感谢我的母校: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这是我成长的摇篮,是我眷恋的乐园。在这里生长的一草一木,都会勾起我一缕缕情愫;而老师们的一言一行,都能让我终生受益;就连同窗间的一吵一闹,也显得那么生动别致。有谁不说母校好呢!

我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邹贤俊、熊铁基两位先生,他们作为我的研究生导师,引导我走入史学园地,而在教学、科研各方而,都给我很多的鼓励,给我很大的帮助。在这20年中间,如果说我有一点成就的话,也包含着他们的功劳。

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们,不知道有多少次,也记不清在何处,曾与丁毅华、邓鸿光、刘筱红诸君一起,讨论过秦汉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问题;曾与周国林、刘韶军、刘国建诸君一起,研究过中华谋略文化、《孙子兵法》问题;曾与王玉德、姚伟钧、董恩林诸君一起,探讨过中华神秘文化、历代皇室问题;曾与晏绍祥、沈志安诸君一起,切磋过世界古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问题;曾与马良怀、李晓明、吴琦诸君一起,开展过桂子山读书活动;曾与罗家祥、刘伟诸君一起,商讨过历史系发展问题。虽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说起来有点琐碎,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这共同的事业和追求,使我们结下深厚的友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份友谊的力量,促使我在工作中不断思索,在学术上不断开拓。

人生不惑须励志,既然这只是“初步”,就应当迈开大步,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既然这只是“初次”,就应当加倍努力,多作一些学术研究,留下璞石传后人。

赵国华

2002年9月6日

目 录

自 序	(1)
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特征	(1)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初探	(14)
论中国历史上的皇位更迭问题	(24)
关于谋略与传统文化的思考	(42)
论汉武帝的战争艺术	(61)
王莽改制失败原因试析	(71)
东汉统一战争的战略考察	(82)
东汉清流的民本实践	(95)
论“凉州三明”	(116)
战国时期的秦楚关系	(132)
三国时期的吴蜀关系	(148)

三国时期的魏吴关系·····	(165)
赤壁之战与三分之局·····	(182)
司马迁史学的主要成就·····	(194)
谈范曄《后汉书》的序、论、赞·····	(202)
东汉儒学主体评论的研究·····	(216)
荀悦《申鉴》的成书时间·····	(227)
汉鸿都门学考辨·····	(237)
中国兵学史的基本问题·····	(259)
论汉代兵学文献整理的成就·····	(281)
唐宋时期兵学的文化背景·····	(296)
刘寅与《武经直解》·····	(312)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论(上)·····	(332)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论(下)·····	(344)
郭沫若史学研究法浅说·····	(364)
谈郭沫若对韩非子的研究·····	(378)

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中央集权为形式的政治体制。它伴随中国社会走出野蛮状态,跨入文明时代而产生,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的缓慢发展而发展。中国数千年来以传统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村社会,是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中国数千年来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内部的社会调和,以及同游牧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各种联系,是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依据;中国数千年来日益积累起来的,特别是从诸子百家以后不断阐释、衍化而来的各种国家政治学说,是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环境。正是在这一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呈现出一系列基本特征:专制主义、官僚政治、政教一体、华夷分治,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专制主义的本质是君主独裁。在中国传统时代里,国家权力结构如同金字塔,自上而下,从高到低,由一展层权力等级构筑起来。君主的位置正处在这座金字塔的顶端,其下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机构,而基层权力机构组成塔基。君主作为国家机器的主宰者,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

君主操纵的国家权力,大致包括下列几项:1. 按照王、公、侯等品第,对皇室、宗族和臣下有功者,给予分封和爵赐。2. 对全国各

级行政区域的划定,以及各级官僚的任免和奖惩。3. 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货币和度量衡制,控制国家的财政预算和支出,决定与外国通航、通商。4. 统帅和指挥全国的武装力量,决定战争的实施和终止。5. 制定和颁行国家的成文法律,对整个社会进行监控。6. 确立各项文化、教育和考试制度,裁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7. 通过朝贡——封赏的方式,确立和维护对臣属国家、政权的宗主地位。

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君主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总是具有很强的专断性、任意性,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国家的治乱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专断性,表现在国家的最高权力,仅仅归属于君主个人,而不是由中央政府集体掌握。这种任意性,表现在国家的最高权力并不是按照既定的政治法规运行,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君主个人意志所支配。所谓“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①,就是指此而言。这种决定作用,表现在君主操纵国家的最高权力,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所谓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贤者其国乱”^③,说的就是此意。

君主专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自从殷周时代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最基本的政权形式。我们说专制主义的存在,就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水平而言,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④。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小农经济,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自然经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水平,成为专制主义赖以存在的必备土壤。换句话说,君主专制之所

① 《汉书》卷60《杜周传》。

② 《论语·子路》。

③ 《荀子·议兵》。

④ 另外,有人认为专制主义是以地主经济,或者小农经济为基础的。

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二、三千年之久，归根结蒂是由整个社会经济水平所决定的。

不独如此，专制主义的长期延续，还有赖于在政治上对君主专制的强化。强化君主专制，就意味着君权对相权的剥夺，对财权的集中，对军权的独揽，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对知识分子的严紧束缚。汉代十三州部刺史、尚书台的创立，唐代科举制、两税法的推行，明代内阁、锦衣卫的设立，清代军机处、理藩院的建置，都是强化君主专制的产物。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尽管有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大体说来，在传统政治领域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成为专制主义发展的核心内容。

专制主义以其个人独裁的特点，同一切民主制度都格格不入。自从殷周时代以来，虽然一直存在着君臣共商大政的朝议制和臣僚对幼弱君主的辅贰制，甚至有时出现大臣擅权的现象，但从未产生过制约君主独裁的政治机构，更不存在城邦民主制之类的东西。即便是长期被人们讴歌的谏议事例，也仅仅是对君主专制的某种补充而已。谏议本身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但以其社会责任感和求实精神，同君主专制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激化，又往往导致“强谏多悲剧”的政治现象。所以，对于历史上的谏议制度，不能把它与专制主义分割开来看待，不应该盲目地加以肯定。

能不能说专制主义有利于国家统一呢？不能。这是因为：在专制主义条件下，国家的最高权力操纵在君主手里，国家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及其臣僚的政治作为，而君主之所以为君主，通常是依照嫡长子继承制来确定的，对君主个人的智能没有特别的要求，有时甚至会把一个白痴推上君主的宝座。因此，一旦君主在政治上走向残暴、昏庸、腐败，政权交替的混乱，乃至整个国家的危机，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另一方面，历史上真正的“大一统”局面，都是在政治较为清明的条件下实现的。相比较而言，